

略论古籍丛书中的方志

宋永平

丛书和方志是我国传统典籍中刊刻数量较大的两宗图书。南宋时期，丛书开始出现，而方志已经定型。此后，丛书与方志就相辅相成，关系十分密切。相当多的方志借助丛书而得以流传和保存，方志又极大地丰富了丛书的内容和种类。清代以后，更出现了专门的舆地丛书和方志丛书。对古籍丛书中的方志收录情况进行考察，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。

一

丛书是汇集许多种重要著作，依一定的原则、体例编辑且冠以一总书名的图书，是我国传统典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我国最早的丛书是《儒学警悟》，该书成书于南宋嘉泰二年（1202），但流传十分稀少。因而学术界一般以南宋咸淳九年（1273）左圭的《百川学海》和元代陶宗仪《说郛》为丛书之鼻祖。《百川学海》所收多为唐宋人杂著，间有两晋南北朝人之作，共计100种，分为10集，方志尚未收入。《说郛》有两个版本：一是钞本，为明代传钞，近代张宗祥重校，商务印书馆铅印，世称“涵芬楼本”。此本厘为100卷，收书共615种，方志归入其卷六，有常璩《华阳国志》、释道安《西域志》、江敞《陈留志》、宋敏求

《长安志》、李昉《九域志》等。二是刻本，为明末清初陶珽重新校辑，清顺治年间由宛委山堂刊刻行世，即“宛委山堂本”。该本分为120卷，收书达1250种，其中方志有48种，集中在卷六十、六十一、六十二、六十三、六十四等卷中，著名者有李京《云南志略》、戚辅之《辽东志略》、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、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等。

明代，综合性丛书有所发展。嘉靖以前丛书的体例多仿《百川学海》，内容以汇集子部杂著为限。嘉靖以后，私家刻书事业日益兴盛，丛书更是层出不穷。程荣《汉魏丛书》、何允中《广汉魏丛书》、李栻《历代小史》、王文陵《百陵学山》、吴琯《古今逸史》等，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丛书。在这些丛书中，方志及有关各地方风物民情的书籍偶有收录。但总的来看，方志在丛书中的地位尚未确立。

二

清代是从书刊刻的鼎盛时期，无论数量或是质量均为前代所不及。清代丛书刊刻大致可分为初、中、晚三个时期。

清代初期包括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三朝。清统一全国后，实行高压政策，在文化上大兴“文字狱”，许多知识分子只得埋头在古代经史的研究中，较少注意社会现实。这一时期刊刻的丛书也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特征，即在内容上以汇集经史著作为多。如，纳兰性德《通志堂经解》汇刻宋元以前理学家之著述，而曹溶《学海类编》则汇集宋以后至清的经史书籍达430种，其他如顾炎武《音学五书》、汪士汉《秘书廿一种》、张潮《昭代丛书》、王昶《檀几丛书》等亦是以经史为主，较少注意方志。

清代中期从乾隆至道光中。此期间，清统治者除了继续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外，还大力主张“稽古礼文”，屡令儒臣编纂各种大型图书，使丛书汇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其中最著名的为《四

库全书》和《武英殿聚珍版书》。

《四库全书》于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开始纂辑，四十六年（1782）完成，藏于皇宫文渊阁。此后，又陆续钞成6部，分藏在圆明园文源阁、避暑山庄文津阁、沈阳故宫文溯阁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、杭州圣圆寺文澜阁。各阁藏本的数量不尽相同。据中华书局影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统计为3461种。《四库全书》的方志，主要集中在史部地理类。史部地理类下细分为宫殿疏、总志、都会郡县志、河防、边防、山川、古迹、杂记、游记、外纪等小类，共收书155种，其中严格意义上的方志有51种。具体为：总志7种，有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、东史《太平寰宇记》、王存《元丰九域志》、欧阳忞《舆地广记》、祝穆《方輿胜览》、李贤《明一统志》和《大清一统志》；都会郡县志25种，均为宋元明三代之名志佳构，如宋人罗愿《新安志》、周应合《景定建康志》，元人潜说友《咸淳临安志》、袁桷《延祐四明志》，明人康海《武功县志》、韩邦靖《朝邑县志》等等；清修各省通志19种。另外，《四库全书》的史部载记类也收入了樊绰《云南志》（《蛮书》），常璩《华阳国志》、黎崱《安南志略》等方志。据查，在古籍丛书中，《四库全书》收录方志的种类和数量均居于首位。

纂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四库馆臣们还从大量古书中辑佚出许多古籍珍本，尤其从明修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者最多。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由武英殿制木活字，将这些珍本汇印成《武英殿聚珍版书》。聚珍版书共收书138种，方志有5种：樊绰《云南志》、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、欧阳忞《舆地广记》和王履泰《畿辅安澜志》。

乾隆至道光时期，考据之学蔚为盛行，考证、辑佚、校勘等大家辈出，成果硕硕。这些成果较突出地反映在他们刊刻的丛书之中。因而此时期丛书门类繁多，或新疏群经、或精校古子，或

辑佚、或辨伪，成为历史上丛书刊刻的鼎盛时期。许多方志（尤其是宋元方志）被收入这一时期刊刻的丛书而得以保存和流传。现将主要情况分述如下：

第一，仿宋元旧刻的丛书。这类丛书所收之图书，多据私家珍藏的宋元善本精工复制成，版本价值极高。著名者如黄丕烈《士礼居黄氏丛书》，该丛书收书23种，均据黄氏“百宋一廛室”所藏珍本复制。方志有欧阳忞《舆地广记》，系景刊宋本而成，为《舆地广记》最早的版本。后来蜚英馆、石竹山房、博古斋等版本的《舆地广记》均据黄氏本景印。其他仿宋元旧刻的丛书还有李锡龄《惜阴轩丛书》、胡珽《琳琅秘室丛书》等等，均景印或仿制了一些有价值的宋元方志。

第二，辑佚古籍的丛书。这类丛书荟萃了当时辑佚学的成果，为后人研究考索提供了极大便利。著名者有黄奭《黄氏逸书考》、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、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、孙星衍《岱南阁丛书》等等。辑佚古籍的丛书与方志的关系较为密切。例如，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收入王氏所辑佚的汉唐有关图经、地志共50种。又如，孙星衍《岱南阁丛书》收入其辑佚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40卷并附佚文1卷，《括地志》佚文8卷。凡此等等，使人们通过辑佚古籍的丛书能够窥见某些久佚的古方志的面貌。

第三，网罗遗稿的丛书。这类丛书主要网罗收集那些仅有传钞而无刻本，或者流传久远而原版散佚者。著名的有鲍廷博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李调元《函海》、阮元《宛委别藏》、陈春《湖海楼丛书》等。这类丛书收入了部分具有较高版本价值的方志。如阮元《宛委别藏》收入各类著作162种，多为宋元钞本或景钞本。方志计9种：路振《九国志》残本（系曲阜孔氏旧钞本），杨潜《云间志》三卷（钞本），卢宪《嘉定镇江志》（钞本），施谔《淳祐临安志》残六卷（景宋钞本），万凌顷《玉峰志》三卷

（钞本），俞希鲁《至顺镇江志》二十一卷（钞本），杨漣《崑山郡志》六卷（钞本）、不著撰人《重修琴川志》十五卷（景汲古阁钞本）。均有很高的版本价值。

第四，精校古籍的丛书。此类丛书多为当时校勘名家所汇刻，收录他们校勘、疏释经史著作的成果，方志也偶有收入。如，钱熙祚《守山阁丛书》中有《九国志》12卷附拾遗1卷、《吴郡志》50卷附校勘记1卷。又如，毕沅《经训堂丛书》有宋敏求《长安志》附图3卷，等等。

清代晚期，即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。这一时期，由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，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，促使知识分子思想发生了变化，学术观念也有所更新，故而丛书的刊刻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。

一是部分丛书仍沿乾嘉余波，继续以汇刻校勘古籍为主。蒋光煦《别下斋丛书》、伍崇曜《粤雅堂丛书》、钱培名《小万卷楼丛书》、蒋凤藻《铁华馆丛书》、缪荃孙《藕香零拾》、徐乃昌《积学斋丛书》即是代表。这些丛书的编辑者和刊刻者，或是藏书家、或是校勘家、或是著述家，因而底本精良、校勘审慎，历来为学界器重。但这些丛书较少收录方志。

二是部分丛书向更加专门化发展，出现舆地、金石、目录、诗词、戏曲以及西学东渐内容的丛书。在专门性的丛书中，舆地丛书与方志关系最为密切。现分述其要者：1、《小方壶斋舆地丛书》，王锡祺辑，编辑始于光绪二年，至光绪二十三年结束。分为初编、补编、再补编各十二帙，共收书1436种。内容包括地理总论、各州形势、各省地理、旅行纪程、山水游记、风土物产，兼及少数民族风俗生活、欧美各国见闻等，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舆地类丛书。2、《问影楼舆地丛书》，胡思敬辑，收有边疆舆地类书籍15种，方志有李荣陛《云缅山川志》、檀萃《滇海虞衡志》两种。3、《蓬萊軒地理学丛书》（又称《浙江图书馆丛书》），丁

谦辑，汇集了汉晋迄元明有关四夷的地理志及考证凡30种。4、《历代地理志汇编》，罗汝南辑，共分为十四编，收入历代地理志及考证共55种。5、《麓川精舍丛书》，陈运溶辑，厘为“辑佚”和“释地”二集，收录有关荆湘地方的人物、图经、地志共66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清代晚期甚至出现了专门汇辑某地旧方志的小型丛书，如吴炳南《合刻华州志》、缪朝荃《汇刻太仓旧志五种》、徐时栋《宋元四明六志》等。这类旧志丛书刊刻和印制数量有限，但对旧志的流传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三

民国时期，古籍丛书的编纂和出版门类繁多，数量也较为可观。其中，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四部备要》和《丛书集成》以价值高、影响大而被誉为“民国三大丛书”。

《四部丛刊》是由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倡导编辑的，从民国11年（1922）到民国24年（1935）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初编、续编和三编，合计收书477种。《四部丛刊》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分类。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版本价值，所收之书多为涵芬楼所藏善本，宋元刻本、写本为数不少，明清佳刻更比比皆是，因而颇受学界的重视。《四部丛刊》收入方志3种：《华阳国志》12卷，系景明代钱谷钞本；《大清一统志》560卷，据乾隆间手抄本景印；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据顾炎武手稿本景印。均为罕见之善本。

《四部备要》于民国13年（1924）由中华书局开始编辑，到民国20年（1931）共出版5集，收书凡336种。该丛书以聚珍仿宋版铅字排印，初为线装本，后改为平装和缩印精装。编辑原则是突出实用性。因而，在版本选择上特别注意清代学者的笺疏注释本，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《四部备要》收录方志1种，即《华阳国志》，此本为清代廖寅“题襟馆”刊本，末附廖寅撰

《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》1卷，讹漏较少。

《丛书集成》于民国24年至26年（1935~1937）由商务印书馆辑印，汇集了自南宋《儒学警悟》迄清末的各类重要丛书100部，成为集丛书之大成者。《丛书集成》实际收书达3467种，与《四库全书》相当。分类方法也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，采用近代图书馆分类法来划分，有总类、哲学、宗教、社会科学、语文学、自然科学、应用科学、艺术、文学、史地等10个大类，每类下又细分出小类若干。方志收入史地类，共计有20种。其中著名的有范成大《吴郡志》、郑瑤《严州续志》、周淙《临安志》、李调元《罗江县志》、檀萃《滇海虞衡志》。由于《丛书集成》多用铅字排印并加以断句，印刷数量较大，对于所收方志的普及和流传起了积极作用。

除上述三大丛书外，民国时期还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丛书。公家刊刻出版的有：商务印书馆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》、《涵芬楼秘籍》、《景印宋元明善本丛书十种》、《续古逸丛书》，故宫博物院《天禄琳琅丛书第一辑》，中华书局《袖珍古书读本》等。私家刊刻的种类和数量较多，著名的有刘承干《求恕斋丛书》、《嘉业堂丛书》，张均衡《适园丛书》、《择是居丛书》，郑国勋《龙谿精舍丛书》，郑振铎《玄览堂丛书》，罗振玉《鸣沙石室丛书》，谢国桢《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》，等等。公家刊刻的丛书较少注意方志，私家刊刻者则偶有收入。如刘承干《求恕斋丛书》中有《渤海国志》，张均衡《择是居丛书》中有《吴郡志》。值得一提的是郑振铎《玄览堂丛书》，该丛书收书71种，多为元明时期边疆图经和方志，其中的《大元一统志》残本、《寰宇通志》190卷，均为《四库全书》和“民国三大丛书”所未收，价值甚高。

民国时期丛书刊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，地方性丛书和自著性丛书大量出现。地方性丛书中较著名的有山西文献委员会编的

《山右丛书初编》、金毓黻《辽海丛书》、宋联奎《关中丛书》、翁长森《金陵丛书》、胡思敬《豫章丛书》、赵藩《云南丛书》、任可澄《黔南丛书》等。这类丛书大量收录本地人士的著作，也纳入了较多的地方志。自著性丛书多为学者汇集，主要收录学者本人的著述精华，如陈垣《励耕书屋丛书》、缪荃孙《艺风堂读书志》、叶德辉《观古堂所著书》等。这类丛书未涉及地方志。另外，民国年间各地还辑印了一批旧志丛书，如陈乃乾《松江府属旧志二种》、王文琳《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》、程熙元《潞水志汇编》、谢道安《束鹿五志合刊》等等。

四

古籍丛书“在数量上占我国古代典籍的三分之一或者说三分之二”^①，而且学术内容和资料价值也非常重要。在收录方志上，丛书也显示出网罗宏富的特点。大者如一统志、通志，小者如府州厅县志、山水风土志，无不可在丛书中求得。丛书对于古代方志的保存和流传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第一，汇集保存方志。丛书把单种方志集中，少则三五种，多则数十种，如清代吴炳南《合刻华州志》收入明清华州旧志4种，民国间王介藩《泰山丛书》收入泰山志3种，而《四库全书》共收入方志54种。丛书这种特有的汇集功用，十分有利于古代方志的保存。譬如，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、经济的重要的方志著述。顾氏27岁时即开始编撰，历时50年尚未定稿刊刻，故未能流传于世。商务印书馆在编纂《四部丛刊》时，经多方搜求得到顾氏手稿，加以景印后收入《四部丛刊》，该书始得流传于世。又如，宋代方志流传至今者大约不超过三十种^②，而《四库全书》就收入了二十二种。人们研究宋代方志，主要是借助《四库全书》的收存。再如，研究清代边疆史地问题，王锡祺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的第一二三帙，即为主要

资料。李慈铭说，丛书可“使存者得以不坠，著述之未成者荟萃而可传”^③。

第二，辑佚补阙。丛书收入了许多已散佚的方志，后人通过丛书进行辑补，使散佚之书得以恢复或部分恢复其本来面目。如，元代李京《云南志略》，系云南方志中最古者，但原本早佚。幸得明初陶宗仪《说郛》收入其《云南总叙》和《诸夷风俗》二篇，使该书片断得以保存。清代师范《滇系》、王崧《云南备征志》所收的《云南志略》的佚文，皆从《说郛》中辑出。另外，通过汇刻丛书，还可以将某些残缺不全的方志补齐。如，元代潜说友《咸淳临安志》原为100卷，但流传既久，往往残缺不全。清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朱彝尊从海盐胡氏、常熟毛氏得宋槧本80卷，又在他处借钞得13卷，合为93卷后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使该书得以基本补全。他如王存《元丰九域志》、施宿《嘉泰会稽志》等，亦是通过编修丛书而补全的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，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、陈运溶《麓山精舍丛书》辑佚古方志的成就巨大。

第三，提供精善之本。古代方志流传时间久远，经多次刊刻或传钞，产生了不同版本，而各版本的优劣则又不尽相同。一般地说，时近迹真，所以人们对于宋元旧刻、旧钞的方志十分重视。但由于宋元本流传甚少，无论公藏还是私藏，往往秘不示人，一般读者极难看到。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提供了这种方便。譬如，南宋周淙《乾道临安志》，堪称一代名志，但到清初已无完整传本。杭州孙仰曾家藏有宋本残卷，奉为至宝珍藏。清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以朝廷名义才从孙氏家中采得，学人也才有机会一睹此志。清代黄丕烈、毛晋、蒋凤藻专门景刻的一批宋元旧刻丛书，民国间《四部丛刊》等，也汇集了一些精善的古方志版本，值得人们重视。

当然，古籍丛书亦非尽善尽美。如卢文弨所言，某些丛书所

收的方志“真伪不分，雅俗不辨，或删削而非完善，或脱讹而鲜校讎”。这些现象在明代中后期的丛书中还很明显。比如，《华阳国志》原书的卷十分为上中下，何鏜《汉魏丛书》吴琯《古今逸史》均仅刻其下而遗其上中。这些都是应该指出的。

注：

①刘尚恒著《古籍丛书概说》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。

②来新夏著《方志学概论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③李慈铭《式训堂丛书·序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袁俐）